

《出版法》的修正： 国家与报界关系之递嬗（1928—1937）

徐基中

摘要

本文以报界对1935、1937年《修正出版法》的不同态度为线索，尝试揭示1928—1937年国家与报界关系之递嬗。此一时期二者的关系并不是一个国家全力干预报界、报界全力抵制国家的问题。训政初期，国家与报界的关系尚处于磨合探索阶段。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家不断强化对报界的规训和干预，报界奋起抵制，二者走向紧张对立的状态。随着国难日亟，报界的民族主义高涨，为了国族利益，暂时压抑了自由主义的诉求，向国家让渡部分权利。同时，国家政策的调整，均使得二者关系转向缓和。更进一步，国家与报界在“国族利益”的认知上渐趋接近，最终形成了团结御侮的局面。由磨合至紧张至缓和再至合作的多次嬗变，显示了这一时期国家与报界关系的多维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

出版法、新闻统制、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国族利益

作者简介

徐基中，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电邮：djin1900@163.com。

Amendment of the Press Law: Chang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Press (1928-1937)

XU Jizhong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point out the different attitudes of the Press towards the Press Law Amendment in 1935 & 1937, which implies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Press from 1928 to 1937 in China. During this perio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was not mean that the State lent full intervened the Press, while the latter resisted the former at the same time. Because of the Political Tutelage and Mukden Incident, the State strengthened its control over the Press, which caused the resistance of the latter. Therefore, their relationship

was strained. Due to the increasing national crisis and nationalism, the Press restrained the appeal to liberalism. Meanwhile, the State adjusted the policies toward Japan and the Press. Their relations have eased. At last, they have reached a consensus on national interest. In summary, this paper reveals the multi-dimensional and complexity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Press in this period.

Keywords

Press Law, press control, liberalism, nationalism, national interest

Authors

Xu Jizhong is a doctoral candidate at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mail: djin1900@163.com.

在学界的主流话语叙述中，中国新闻史就是一部国家压制报界（本文特指民营新闻事业）、报界起而抗争的革命斗争史。这无疑将二者的关系简约化、刻板化，不利于认识历史原貌。所幸徐小群先生已撰有专章，讨论1912—1937年民国政府与上海报界的关系，指出了上海报界的政治诉求和职业关切对二者多维关系的形塑（徐小群，2007）。本文拟在此基础上，以报界对1935、1937年《修正出版法》的态度变化为线索，尝试揭示1928—1937年国家与报界关系之递嬗。

一、报界对两次《修正出版法》的不同态度

1930年《出版法》因其草创，条文失于简略含糊，国家与报界均感不便，乃由内政部拟具出版法修正案，于1935年7月12日经立法院审议通过。此次修正，变更较大者有以下几端：

（一）废弃呈报制，改用核准制。

1930年《出版法》规定出版品登记注册后即可发行，《修正出版法》则明令出版品在声请登记时，必须经地方主管官署核准后始得发行。虽然二者均属预防制，但呈报制最为宽松，仅科出版者于出版物发行前，向主管官署担负报告之义务而已，主管官署却无权拒绝其出版（刘杰材，1935）。此一改变，直接决定了其后国家对于报刊登记审核的严格性。至于登记事项，较1930年《出版法》增加了社务组织、经费来源及收支预算、编辑及发行计划等，巨细靡遗。其目的固有防止滥设报刊的考虑，亦藉以明晰报社的背景，而便于统制（壮行，1935）。

（二）扩大地方权限。

按照1930年《出版法》，地方主管官署为省政府或隶属于行政院之市政府。

《修正出版法》则将权限下放,规定地方主管官署在省为县政府,在隶属于行政院之市为社会局,并在保留上级机关原有权限的同时,授予县政府或社会局对出版品以就近扣押、取缔等权力。

(三) 增加禁载事项。

《修正出版法》对出版品登载事项之限制较1930年增加许多,规定“关于诉讼事件,非俟判决后不得批评”、“关于个人或家庭隐私事件不得登载”;战时或遇有变乱时禁载或限制登载者,在军事、外交之外,增加政治及地方治安两点;以广告、启事、照片、图画等方式登载于出版品者,亦应受规定之限制。

此前,报界呼吁《出版法》的修正应以保障言论自由为基本精神,对于禁载事项当以直接危害国家、扰乱社会者为限,且应明晰列举,执行处罚应经司法机关判决,除司法、警察机关以外之任何官厅不得干涉或处罚等(国闻周报,1932)。但从此次修正结果来看,当局对报界意见一无采纳,且专尚统制,根本背离报界意愿。故一经通过,立即引发全国报界抗议。

上海日报公会、上海市新闻记者公会、北平新闻记者公会、天津市报馆业同业公会、广东省报界公会、广东省新闻记者公会联合会、广州市新闻记者公会、济南报界公会、青岛新闻记者公会、安徽省记者公会、汕头记者公会等,纷纷致电国民政府、中央党部、中央政治会议、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内政部等,指陈《修正出版法》变更各点窒碍难行,束缚报界綦严,不合保障舆论之旨,请另订原则再予修正,并通电全国报界一致行动。无锡新闻记者公会联络苏州、常州、江阴、武进、常熟等地同业40余家,组织赴京请愿团。《大公报》《申报》《北平晨报》《益世报》《中华日报》《大光报》等纷纷发表社评,一致请求当局俯顺舆情,重订《出版法》。

面对全国报界的共同抗议,中央政治会议决定重订修正原则,交行政立法两院遵照。行政院即令内政部拟具修正草案,于1936年11月27日经立法院会议通过,次年7月8日公布实施。检视本次修正与1935年之修正,变化有如下几点:

首先,采纳报界部分意见,删去了第九条登记事项中“编辑及发行计划”及第四章禁载事项中“关于诉讼事件,非俟判决不得批评”两项。行政处罚部分明确了新闻纸类在受到行政处分时,可以向处分机关之上级官署诉愿,该管官署应于接受诉愿后十日内予以决定。

其次,对报界意见和国家意志进行折中。保留了核准制,对地方主管官署亦延续1935年的界定,但将出版品声请登记的核准权改为省政府或隶属于行政院之市政

府,县政府或社会局负有呈转之责。对出版品的处罚亦须经上级官署核准后方可执行。登记事项中的“经费来源及收支预算”改为“资本数目及经济状况”,规定在人口百万以上之省政府或市政府所在地刊行报纸者需资本一万元以上,人口未达百万者六千元以上。取消禁载事项中“关于个人或家庭隐私事件不得登载”的单列条文,将其归入“不得为妨害善良风俗之记载”中。

再次,增加新的限制,如第十二条“新闻纸中专以发行通讯社稿为业者,地方主管官署于必要时,得派员检查其社务组织及发行状况”;第十四条违反禁载规定、或因贪污、欺诈而受刑事处罚者,不得为发行人或编辑人;第三十二条新闻纸或杂志如违反禁载规定,情节重大者,由“内政部得定期或永久停止其发行”。

最后,扩张党权。1930年《出版法》颁布之前,报纸登记事项由各省或特别市党部宣传部办理,立案事项则由行政机关负责。(王凌霄,1996:23-24)这种党政双轨的管理制度,在《出版法》颁布后得以纠正,除有关于党义或党务事项之登载者,应向党部、政府两方声请登记外,出版品登记均由内政部办理,实现了党政分离。(法令周刊,1931)而1937年修正后的《出版法施行细则》对出版品登记的规定又回到了党政双轨管理的道路,地方主管官署在呈转登记申请书时,应先送当地同级党部审查同意,再呈送省政府或隶属于行政院之市政府,后者在核定时,亦应送当地同级党部审查同意,准予登记者咨送内政部,经中央宣传部审查同意,始发给登记证。(内政公报,1937b)

可见,1937年《修正出版法》虽对报界意见有所采纳,但保留了核准制,登记审核程序更加繁密,又增加了许多新的限制,且处罚更重,是以统制色彩更为强烈,甚至在抗战后被视为“‘防范异见’‘钳制舆论’‘统一思想’的历史夹棍”(万枚子,1948)。可诧异者,本次出版法修正案在1936年11月通过后,即已载诸报端,及至次年公布实施,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一直未见报界有何异议的表示。那么,报界对1935、1937年《修正出版法》截然不同的态度,是否意味着国家与报界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二、1928—1937年国家与报界关系之嬗变

(一) 训政初期的磨合

1928年6月,国民政府宣布统一告成,训政开始。此时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威望达到高峰,民众对政府领导国家走向现代化寄予了厚望。1929年底蒋介石通电全国报馆,请报界各抒谏言,尽情批评国事。报界亦企望能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有所

贡献：“今者内乱初平，建设方始，起衰振弊，救死弗遑，正国府励精图治之时，即报界发抒谏论之日。”(益世报,1930年11月9日)

训政时期实行以党治国，党义传播尤须仰赖宣传，但此时国民党党营新闻事业实力尚弱，或者说“简直脆薄得很，零零星星虽然各地党部都办理些报纸，最好的也不过成为一种地方的报纸，譬如中央日报虽然是一个中央的报纸，论设备，论物质，与国内较好的报纸比较，有如手工业之与机器工业，如何能竞胜，做一个优良地方报纸都不够，又哪里够号召全国呢！”(严慎予,1929)因此，当局需要借助民间报界的力量推行政令。国民党政权之取得，舆论宣传厥功甚伟。在国家法制建立前，国民党从自身的革命历史中寻找经验。于是党化民间报界，使之辅助训政，就成为当局尝试建立的一种新的国家与报界的关系模式。

报界也面临着全新的舆论环境。由帝制、共和进入党治时代，这是报界从未遭遇过的历史变局，报界对于自身将面临怎样的政治风险还不得而知。同时在北伐战争中以及国民政府推行的“改订新约”运动之下，各国租界被陆续收回。至1931年上半年，只剩下英、法、意、日四国14个租界(费成康,1991:414)。同时，租界法院改组，司法权得以收回(石源华,1994:353-355)。这意味着租界不再是中国报界的避难所，此前受租界庇护的报社，如今要直接面对国家权力。

如何在党治和自由之间寻求各自的位置和边界，对国家与报界而言，都需要经历一个磨合阶段。在此过程中，难免产生碰撞、摩擦。1929年当局连续查封了成都《白日新闻》、重庆《新社会日报》《国民快报》等，四川省报界联合会发出通电宣言，请求各方援助。国民党中宣部函请国民政府电令四川省政府严加制止，倘仍事嚣张，“应即立予解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994a:191-195)。这场冲突可视为报界对国家实行训政决心的试探，而国家予以断然回击，意在树立党治的权威。

虽然，在党化政策之下，报界依然保有相当的独立性。“我们说：一切要党化，他们绝没有党化，……我们说：一切要革命化，他们绝没有革命化，……他们并不和党的言论机关联合一致的前进”(民国日报,1928)，“他们现在似乎很同情于我们，但是无法保证他们永远能同情于我们，并且从历史的教训，他们未必肯代本党来分担训政的工作，这是不必讳言的”(严慎予,1929)。例如，“报界发表的许多政治新闻，实际上不过是把地方政治组织提供的东西公之于众而已。据一位观察家说，有些报社就像登广告一样发布这些消息，以显示他们并不‘赞同这类新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82)报界以此种方式表达它们的反抗。

由于党权的武断专横，“惟其无一定依据之法律，乃得任意加报馆以任何处

分,对记者加以任何暴力”(周孝庵,1930)。故报界期望制定一部《出版法》,俾使其免于因言贾祸、动辄得咎的危险。同时,当局鉴于没有正式的新闻法律可循,以致无法对报界进行指导,“到了认为必要时加以约束和干涉,又很容易受干涉舆论的嫌疑”(严慎予,1929),亦有立法规范报界之意。虽然制定《出版法》契合了双方的需要,但诉求有别。从国家方面来说,重点在消极防范和取缔,以谋报界言论纪事之统一。而报界则希望藉《出版法》约束国家权力的肆意干涉,以法治制约党治,保障报界权益和报业发展。

1930年12月16日,《出版法》公布实施。无疑,《出版法》贯彻的是国家意志,着意于出版品登载事项之限制、行政处分及罚则。尽管未合积极保障之意,报界还是本着“有法胜无法”的态度予以接受(国闻周报,1931)。此时,中原大战終了,国民党中央会亦决定停止新闻检查,国家与报界有望沿着法治的轨道前进。但随着民族危机加剧,二者的关系急速走向紧张状态。

(二) 统制与自由冲突下的紧张

九一八事变后,当局制定的国策为:对内继续消灭反侧,对外暂时忍耐待时,即先安内后攘外。当局一再申述,救国第一要义为完成“近代国家”之组织,其精神“尤在于力量之统一与纪律之严明”,故救亡图存之道,“乃在集中一切救国力量,于中央指挥之下,齐一其步调,巩固其阵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994b:582-584)报界必须“听统一之指挥,守严整之纪律”(浙江教育行政周刊,1931a),“断不容以任何意气感情,摇动中央所决定之方策与步骤”(浙江教育行政周刊,1931b)。易言之,就是要确立国家作为公共权威在中日议题上的垄断权力,不容报界干扰国策之实施,“若何交涉,若何应战,则当惟主持者之命是从,不可轻发意见,掣当局之肘,而贻误耽延”(田炯锦,1932)。

这与报界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的职业关切和言论报国的民族主义诉求是相悖的。因此,当政府对民众的抗日要求反应消极时,报界就标榜自身的公共性和独立性,来抗拒国家权力的垄断性,二者关系遂变得紧张起来。《大晚报》主笔曾虚白提到,上海“成为酝酿不满政府对日妥协情绪的温床”(蔡铭泽,1996),“南京主持宣传的人,经常到上海来,约集新闻界领导人物,解释疏导。新闻界辄视为官方片面之辞,大都自圆其说,未敢尽信。”(曾虚白,1981:246)突出表现为《申报》一改保守谨慎的态度,批评政府的内外政策,宣传抗日救亡,要求民主自由。当局则对其禁止邮递。最终这种激烈对抗导致史量才之死。

为了抑制报界的越轨行为,遂行其国策,当局一方面扩充党营新闻事业,完

善党的喉舌，“以正视听”；另一方面实行新闻统制，厉行新闻检查和取缔，增强对民间报界的规训。1931年10月7日，公布《出版法施行细则》，强化《出版法》的实施。1932年5月，通过《宣传品审查标准》，同年11月增订，确立了正当的宣传、谬误的宣传和反动的宣传之标准。1933年1月，颁布《新闻检查标准》（同年10月修正），侧重删扣有关军事、外交、地方治安之新闻。其时“正当华北抗日战烈，对日外交紧张之际。斯时举国皇皇，不可终日，报纸一面为传达军政要情，一面领导舆论，其取材著述，最关国际观感，人心意图；……顾以时局瞬息万变，当局应付繁艰，欲使政府与新闻界屏弃隔膜之藩篱，而一贯其声气”（张研，孙燕京，2009:239），乃有《重要都市新闻检查办法》之颁行，在舆论重镇京沪平津汉等地设立新闻检查所。各地“检查手续因各所组织不同与地方上环境不同，以致不能一致，故新闻界对检查所及中央宣传委员会常发生误会”（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994a:191-195）。1935年6月10日，颁布《睦邻敦交令》，申儆国民、尤其是报界：“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如有违背，定予严惩。”（彭明，1989:371）积极营造“和平亲善”空气，进一步收缩报界言论自由的空间。据《中国国民党年鉴》统计，1934年“全国报刊，言论正确的约占百分之廿五”，能以“理性态度”讨论对日关系的，“居于少数”（赖光临，1992:160）。这既表明虽然国家管控严密，报界依旧表现了坚韧的独立性，努力为国纾难；也暗示了当局必然会对那些“非理性态度”或“错误言论”严加取缔。

报界非但不能在民族救亡的议题上畅所欲言，对内亦陷于动辄得咎的境地。1934年为报界的多事之秋。5月24日，南京《民生报》载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贪读事，汪精卫径令停刊三日。7月20日，《民生报》又载民族通讯社消息《蒋电汪勿走极端！》。民族通讯社被封闭，《民生报》被永久停刊，成舍我遭拘禁达40天。同月，南京《朝报》因载汪精卫事，受到停刊一日之处分。8月20日，天津《益世报》文涉黄郛，蒋介石电令河北省政府予以停止邮寄邮电处分，主笔钱端升辞职。9月，《北平晨报》、上海《时事新报》亦遭受停邮处分。11月13日，史量才被暗杀……当局对报界制裁之严，殊令国民党中宣会主任邵元冲深忧：“（蒋）介石近日对于新闻事业及记者严格之制裁，非特将中央宣传会之职权尽量侵越，且虑引起新闻界此后之反感，殊不知所以善其后也”，“对舆论抑制太过，殊虑异日之反攻也”（邵元冲，1990:1136-1156）。可见，党国政要的个人意志超越法律之上，增加了国家与报界之间的张力。

1933年刘煜生案发生后，全国各地新闻团体、记者公会纷纷发表通电宣言，要

求惩办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迫于报界压力,行政院发布了《保护新闻事业人员令》,通令内政部、军政部,转飭各省市政府、各军队及军事机关一体遵守。然而,命令仅仅宣之于口,并未见之于行,报界遭受摧残如故。杭州市新闻记者公会乃倡议定命令发布之日9月1日为记者节,得到全国报界认可。这一民间节日的设立,既是报界职业化的表征,也是向当局施压、敦促其践行前言,切实保障新闻事业之安全与自由,颇具政治象征意义,隐寓以报界之合力与国家分庭抗礼。

总之,九一八事变后,国家与报界冲突的焦点在于新闻统制与言论自由之间的矛盾。对报界而言,不论是对外站在民族解放的前线、发挥“纸弹歼敌”的作用,还是对内监督政府、向导国民,都必须保障言论自由。这与国家新闻统制的方针是背道而驰的。因此,经由修正《出版法》,为报界立一个新的言论标准和惩戒依据,就成为国家的当务之急。此举又进一步加剧了二者的紧张关系。

(三) 政策调整后的缓和

妥协退让无法满足日本的野心,1935年华北危机愈演愈烈,最终促使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转变。11月19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发表“最后关头”演说,标志着对日强硬政策的开始,这也为新闻政策的调整开辟了道路。23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评:“这几年来,报纸上告诉人民的,有多少关于国家安危的纪载?这几年来,报纸上有没有把一件严重的关系国家安危事件,原原本本详细告诉过国民?……谁使我们的报纸,弄到这步田地?这是不合理的新闻政策,及不合理的新闻检查制度所造成”,“把我们国家与民族的一切生机都斩完了”。因此,挽救国难的一个初步的根本办法,“是政府赶快改变新闻政策”。(中央日报,1935年11月23日)在随后召开的五届一中全会上,周佛海、潘公展等50余名委员又提出开放言论、保障新闻事业的议案。新任内政部长蒋作宾亦宣称以后应切实保障言论自由,并打算与报界合作。

可见,国难日亟,开放言论亦成为当局内部的诉求,新闻统制政策已到了必须作出调整的时刻。12月10日,国民政府通令保障正当舆论。同时,五届一中全会决议:“对于全国新闻界出版界以及其他文化事业团体,应本统制之精神,改变以往消极取缔之办法,而有积极领导之计划导入健全发展之途径,一新社会之观感”(秦孝仪,1979:375)。当局已经认识到,统制新闻不可专赖检查取缔,尚须引导扶持,变消极统制为积极统制。这与报界一直呼吁的新闻统制合理化正相契合。至此,国家的新闻政策开始有了若干积极改变,加之救亡态度的趋同,国家与报界的关系开始向着缓和方向变化。是以《出版法》再度修正时,对报界意见有所容纳,

即为国家向报界发出的积极讯息。

1936年10月3日,京沪21家主要报社联名发表《中日关系紧张中吾人之共同意见与信念》,表示要“整齐步骤,集中意志,以听命于整个之国策”(中央周报,1936a)。宣言发表后,全国各地报界纷纷响应。汉口报界主张,全体国民“宜在统一指挥整齐步伐条件之下,一致起而牺牲身家,捍卫邦国”;广州报界宣称:

“政府未宣示和平绝望之时,宜沉毅坚定,以应事变;政府指示吾人应作最后牺牲之日,则争先效死,以博光荣”(新闻杂志,1936)。此一宣言由陈布雷和程沧波共同拟写(陈布雷,2009:157),实为政府立场,而京沪报界参与联署,即在某种程度上持赞同态度。各地报界起而响应,而且它们所采用的正是国家一贯的话语叙述方式,二者关系之缓和不言而喻。

(四) 国族利益至上下的合作

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取代了国家与报界之间新闻统制与言论自由的矛盾。报界为求国难的排除和民族的自由生存,从言论自由说转变而为舆论的统一,即“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国论的形成。(黄天鹏,1942)西安事变发生后,全国271家报社通讯社发表共同宣言,略谓:

“中国今日之处境,内忧外患,相逼相乘,生死存亡,千钧一发,处此境地,欲谋国家之独立与生存,惟有确保对内对外一切独立自主之立场,集全国国民心思才力,在一个方针之下,为最大之努力,在此时期,整个国家对任何事件或问题,应绝对把持此一定不移之态度,对任何主义或思想,亦应绝对以民族国家生存为最高基点,坚确把持此种态度,数年来国民政府之国策与施政方针,吾人认为恰合此一标准,确实足以保障吾民族之生存,……根据数年来之事实,吾人坚信欲谋保持国家之生命,完成民族之复兴,惟有绝对拥护国民政府,拥护政府一切对内对外之方针与政策……”(中央周报,1936b;秦孝仪,1983:488-492)

这是报界在国族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下,作拥护政府的集体表态,对当局历年来的内外政策表示谅解。西安事变也为双方合作打开了局面,团结抗日成为国家与报界的共识。报界的共同宣言,“贯彻了国策,造成了举国一致的舆论”(黄天鹏,1942)。当局则在事变和平解决后废止了《睦邻敦交令》等,一些束缚报界的障碍被解除。在国家指导之下,报界言论报国的夙愿正逐步实现。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关于开放言论的提案再次列入议程。蒋介石亦发表谈话,称将改善管理新闻与出版物之办法,且进一步扶助言论出版事业

之发展,使报界在不背国家利益下,得到充分贡献之机会(益世报,1937年2月23日)。对报界持温和态度的邵力子,随后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宣部部长。3月,中央检查新闻处由军事委员会转隶中宣部,亦为国家改善与报界关系的举措。5月,当局再次训令保障舆论,谓扶持民众运动,保障正当舆论,为其一贯政策。近年来国难日增,危机四伏,于民众言论力量必须发挥,仅对图谋颠覆政府者,不能不依法予以抑制(内政公报,1937a)。凡此种种,国家与报界互动频频,形成了团结御侮的局面。因此,在国家面临“最后关头”的时刻,报界接纳1937年《修正出版法》就不足为奇了。

总之,在1928—1937年,国家与报界的关系经历了磨合——紧张——缓和——合作的嬗变过程。国家权力的控制和干预与报界的职业关切和政治诉求之间的矛盾,造成了二者之间持续的摩擦、紧张。虽然自华北危机后,国家对新闻政策做了若干调整,但其统制立场并未改变。1934年1月,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决定“对全国之新闻界及出版界作有效之统制”(秦孝仪,1979:321)。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再次确认:“对全国之报业应施行有效之统制,分别给予切实之扶助,或严厉之取缔,并于必要时收归国家经营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994a:92)。且1937年《修正出版法》对党权的强化和制裁的加重,也意味着国家对报界的控制更加严密了。因此,当局新闻政策的若干调整并不是国家与报界关系由紧张转为缓和、以至走向合作的主要原因,报界自身态度的变化才是关键。

三、报界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消长

中国新闻事业起步于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华文报刊,一方面接续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新闻思想,“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张季鸾,1946:151)。同时又深植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怀有文人论政、报人报国的士大夫精神,因而兼具现代性和传统两种不同的思想资源。这就决定了报界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之消长对形塑其与国家关系的重要性。

由共和体制进入党治时代,报界感受最大的是言论没有军阀时期自由(政之,1934)。信仰自由主义的报界与以党治国的国民党政权之间便冲突不断。1929年,苏州报界协会所属各报为反对新闻检查而一致休刊。1931年12月,上海市党部越权扣留《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和《民国日报》,禁止邮寄。

上海日报公会向上海市党部提出抗议,并分电国民政府、中央党部、上海市政府

等,请求制止上海市党部非法扣报。另外发表宣言,决定即日起,“绝对不受任何检查,绝对不受任何干涉”(申报,1931年12月12日)。可见,报界此时秉持的立场是言论应完全自由,断不容任何个人或机关非法侵犯:“我们站在民主政治的立场,站在法治精神的立场,站在言论自由的立场,对于政府之非法摧残舆论,无论如何,不管政府之持何种理由,都要表示激烈之反对”(孤鸿,1932)。因此,国家权力的强势干预必然引起报界的抵制。

九一八事变后,国家厉行新闻统制,强化对报界的规训。虽然党国要人或政府当局屡有保障言论自由之议,要不过政争之工具或因应时势之姿态,事实上皆成具文。报界认识到,言论自由虽在法理上具有不可摇撼之根据,但在党治之下追求英美式的自由不啻与虎谋皮,因而逐渐从“完全的自由”转向“有限制的自由”。这从报界对新闻统制的态度上即可得证。本来依照自由主义的理念,“言论既有自由,则言论不受统制;言论必受统制,则言论即无自由”(益世报,1937年2月20日)。然而格于事实,报界对新闻统制原则上并不反对,惟希望检查办法、标准、范围等能趋于合理化,呼吁国家不应专恃取缔,亦须积极扶助,寄望于取缔之中兼顾保障,于统制之中求取有限的自由。如1934年11月27日,汪蒋发表联合通电,语及保障言论自由。12月10日,平津报界《大公报》《益世报》《北平晨报》等24家报社,联名吁请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采纳汪蒋意见,内有“检查新闻纵不能立予取消,但各地检查机关应一律遵照中央颁布标准,审慎执行”等语(申报,1934年12月13日),希望国家权力机关不对报界进行法外施刑。12日,上海日报公会、新闻记者公会分电五中全会,重申平津报界的立场(益世报,1934年12月13日)。

报界对新闻统制表示谅解,寻求“有限制的自由”,既是迫于国家权力的压制,也是基于民族主义的立场。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民族主义思潮则贯穿始终,甚或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史云贵,郑华,2008:204)。从严复、梁启超开始,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就主张“己轻群重”、“屈私以为公”、国家自由高于一切。(郑大华,邹小站,2008:5-6)这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式自由主义的主流思想是与民族主义融合,甚至是受民族主义支配下的集体主义的自由观。(史云贵,郑华,2008:205)九一八事变后,自由主义在应对民族危机时缓不济急,在整个的时代思潮中处于弱势地位,“传统的‘道’又一次以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方式占据着自由主义报人的集体意识”(姜红,2005)。

在报界的言说中,民族主义的话语触目可及:“我们所期望的言论出版底自由,仅限于站在民族国家整个利益的立场来努力,就事论事”(至公,1932),“我们

知道国难这么严重,我们知道中国一切太散漫了,所以对于‘统制’,向来是赞同的;既言统制,新闻自亦不能例外,一个人或是一种事业,忽然受人统制,在事实上,自然感到许多不便;但是国难这样严重,只要有益国家民族,我们个人或是事业受点拘束,是应当的……”(王健秋,1936)救亡纾难,是报界孜孜以求的;言论自由,又是报业的生命所在。面对国权与业权的两难,报界最终选择了国族利益至上,为争取国家自由和民族独立而奋斗,虽牺牲自身的自由亦所不惜。

总之,报界初以自由主义为号召,“对于国事之论述,亦每以敢言自豪”(黄天鹏,1942),这背离了国家的政策,二者间的紧张关系不言可喻。随着国难加深,报界的自由主义减退,民族主义崛起,报界不再追求“完全的自由”,而是寻求“有限制的自由”,向国家让渡部分权利,这能够缓和与国家间的紧张关系。但是,报界的民族主义高涨,并不必然地促使其与国家合作。团结御侮,还须双方在“国族利益”上达成谅解。

四、国家与报界的“国族利益”之辩

在三民主义的逻辑架构中,民族主义被置于最重要的位置。事实上,对于20世纪20—40年代的国民党政权而言,民族主义正是它号召、动员和组织民众最主要的工具,任何大的社会政治运动中,皆可见其制造的民族主义的“话语装饰”及其所产生的实际成效和重大影响(暨爱民,2013:217-218)。而利用国难来制造民族主义的“话语装饰”,以“国族利益”相号召,也是国家一直试图迫使报界就范的一种策略。

在当局的言说中,实行新闻统制正是为了“国族利益”。国难肇起,时论汹汹。“蚩蚩者氓,莫辨是非,影响所及,必将陷我民族于断潢绝港不止也。中央有鉴于此,为保障新闻事业之正当发展,阐扬新闻之‘真实性’,并发挥其‘造福社会’之天责起见,故特有新闻检查办法之规定”(方治,1934),其目的在于“改造一般新闻记者,革新整个的中国报纸,皆能以国家的自由和利益为立场,成为一支复兴民族有力的生力军”(前途,1936:12)。

因此,以“国族利益”的名义压制报界的自由主义诉求便显得“名正言顺”:
“今日言论自由已不及国家自由之重要”,“我们要依据国家的自由与利益,而不应依据个人或某一阶级的自由与利益来发布新闻”(前途,1936:9)。“我们自由的精神,要用到为国家民族争自由的上面去,更要以不妨害国家民族之自由为范围,因为只有国家民族,才是自由的源泉……”(胡汉民,1930)言下之意,“国族利益”高

于一切，“国家自由”优先于报界权利，报界必须依据国家的自由和利益来立言纪事，否则就是误国，从而将报界推向“道义”的边缘。

理固宜然，但当局口中的“国族利益”并不是报界所认同的“国族利益”。国民党继承孙中山思想，实行以党治国，坚持“党在国上”、“先党后国”，党权高于国权(邵宇,2009:185-187)。因此，如果剥离了民族主义的“话语装饰”，当局所声称的“国家自由”就是“党的自由”、“政府的自由”，甚至是“领袖的自由”，“国族利益”也就变成了党和政府的利益。

有鉴于此，报界再次高举其公共性，以公共利益代言人的身份驳斥当局的“国族利益”：“民族的自由，国家的自由，并不就等于政府的自由，尤其不是官吏的自由。对关系国家存亡的事宜，报人自然会为了民族国家的权益，对新闻有所取舍，于言论有所抉择。反之，以取舍之权授官吏，则所谓为了国家自由而削减人民的自由，事实上适成压迫人民以造成官吏的自由而已”(袁殊,1937:1-2)。可见，国家与报界的“国族利益”畛域分明，一为国民党一党之私利，一为全体国民之公益。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紧张关系反而会更加激化。那么，二者的“国族利益”是否有接近的可能呢？或者说，当局能否成为“全体国民之公益”的代表者呢？

1935年1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发表“最后关头”的演说，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蒋在对日政策演说中态度最为明确、强硬的一次，标志着国民政府对日强硬政策的开始(石源华,1994:485)。五全大会后，蒋介石代替汪精卫，自兼行政院长，削弱政府中亲日派的力量。同时整编全国陆军，制定国防规划，划分国防区域，构筑国防工事，为抗战做准备。1936年7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重申“最后关头”的原则：“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的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章开沅,朱英,2009:603-604)。这表明当局已明确捍卫国家自由和民族独立的决心，其“国族利益”已显示出超越国民党一党之私的趋势。西安事变发生后，全国各阶层、各党派意识到国民政府是唯一能够领导抗战的合法政府，报界亦有共同宣言的发表，承认政府的内外政策“确实足以保障吾民族之生存”。此后，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又实现了对内政策的转变，“攘外必先安内”被放弃。同时，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的中国也达到了王芸生所说的“空前的统一”：“国民党内部问题完全消释，国共两党结束了十年长期战争，政府的威信，领袖的号令，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王芸生,1989:1-2)。

有学者指出,近代以来的中国问题背景,决定了中国人的权威观始终受到民族主义因素的影响。“其最明显的表现是,人们在判断一个政治集团或一个政府是否‘合法’时,所依据的一个重要标准,简单地说,就是这个政府或政治集团能否真正地外求民族独立,内求国家统一。”(暨爱民,2013:218)自国民党五全大会后,当局所昭示于国民者,正是外求独立、内求统一,由此逐渐确立了其作为“全体国民之公益”代表者的权威。这是国家与报界走向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因。1937年2月,国民党确立的新闻政策,规定:“国族利益高于一切,全国报业言论之方针,业务之进行,绝对不得妨碍国族的利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994a:92)。我们不敢妄断国家与报界的“国族利益”是否取得了完全一致,但无疑前者的“国族利益”已经涵括了报界的部分诉求。由此,二者团结御侮的条件得以成熟,这是报界接纳1937年《修正出版法》的关键所在。

五、结语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国家角色日益加强,国家权力不断向社会进行扩张和渗透,形成了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报界则以其独立性和公共性支撑着社会的一端,抵制国家的干预。训政开始后,国家一直试图增强规训和控制报界的能力。派遣国民党党员进入民营报社指导其业务,或提出官商合办(陶菊隐,2005:123-124),或对民营报业予以接收等(邵元冲,1990:1042),都是国家权力向报界的延伸和渗透,这与报界的自由主义信仰是格格不入的。随着九一八事变发生,当局为实施其国策,进一步强化了对报界的规训,要求报界必须服从其“国族利益”,不得逾越。报界以公共利益代言人的身份,抗拒国家的干预和控制。1935年《修正出版法》通过时,正值二者关系紧张对立之际,因而遭遇报界群起抵制。当局允诺重订《出版法》,亦表明报界始终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国家并未将其完全驯化。

国难当前,国家与报界如何妥协,是考量二者是否着眼于国族利益的试金石。报界为了国家独立和民族生存,向当局让渡了部分权利,从“完全的自由”转向“有限制的自由”。这在国家政策未变的情况下,有助于缓和二者的关系。但无论报界是受自由主义抑或民族主义的支配,只要当局不是代表真正的“国族利益”,二者的紧张关系就不会消除。自国民党五全大会后,国家对日政策的转变和新闻政策的调整,逐渐确立了其“全体国民之公益”代表者的权威。国族利益的接近,使得国家与报界的关系由缓和进于团结合作,这也为报界接纳1937年《修正出版法》奠定了基础。

总之, 1928—1937年国家与报界的关系, 并不是一个国家全力干预报界、报界全力抵制国家的问题, 而是随着环境的变化, 双方经过斗争和妥协不断界定彼此之间的关系, 最终形成了冲突——缓和——合作的多次嬗变, 从而呈现出这一时期二者关系的多维性和复杂性。

(责任编辑: 林羽丰)

引用文献 [Reference]

- 蔡铭泽(1996). 三十年代国民党新闻政策的演变. 《新闻与传播研究》, (2), 72-73.
- [Cai, Mingze(1996). Evolution of the KMT's press policy in 1930s.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2), 72-73.]
- 陈布雷(2009). 《陈布雷回忆录》. 北京: 东方出版社.
- [Chen, Bulei(2009). *The Memoirs of Chen Bu-lei*. Beijing: Oriental Press.]
- 法令周刊(1931). 解释通讯社及日报登记办法令. 《法令周刊》, (42), 4-5.
- [Decree Weekly(1931). Registration measures of news agency and newspaper. *Decree Weekly*, (42), 4-5.]
- 方治(1934). 新闻检查与统一民志. 《报学季刊》, 1(1), 15.
- [Fang, Zhi(1934). Press censorship and unity will. *Journalism Quarterly*, 1(1), 15.]
- 费成康(1991). 《中国租界史》.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Fei, Chengkang(1991). *History of the concessions in modern China*. Shanghai: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 孤鸿(1932). 言论界起来打出生路. 《抗争》, (18), 8.
- [Guhong(1932). The press fighting for freedom. *Protest*, (18), 8.]
- 国闻周报(1931). 国民会议与言论自由. 《国闻周报》, 8(19), 5.
- [Kuowen Weekly(1931). National Assembly and the freedom of speech. *Kuowen Weekly*, 8(19), 5.]
- 国闻周报(1932). 出版法与言论自由. 《国闻周报》, 9(14), 4.
- [Kuowen Weekly(1932). The Press Law and freedom of speech. *Kuowen Weekly*, 9(14), 4.]
- 胡汉民(1930). 谈所谓“言论自由”. 《中央周报》, (129), 15.
- [Hu, Hanmin(1930). On the freedom of speech. *Central Weekly*, (129), 15.]
- 黄天鹏(1942). 四十年来中国新闻学之演进. 《中国新闻学会年刊》, (1), 36.
- [Huang, Tianpeng(1942). Evolution of Chinese journalism for 40 years. *The Committee of Chinese Journalism Annual*, (1), 36.]
- 暨爱民(2003). 《民族国家的建构——20世纪上半期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研究》. 北京: 社会科学出版社.
- [Ji, Aimin(2013). *Construction of Nation-state: Research on Chinese Nationalism Trend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姜红(2005).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潮的流变.《新闻与传播研究》,(2),81.

[Jiang, Hong(2005). The evolution of the thoughts of modern Chinese journalistic liberalism.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2), 81]

赖光临(1992).《中国新闻传播史》.台北:三民书局.

[Lai, Guanglin(1992). *History of Chines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aipei: San Min Book Co., Ltd.]

刘杰材(1935).出版法之检讨及其修正之商榷.《中央时事周报》,4(12),44-45.

[Liu, Jiecai(1935). Review and revise the Press Law. *The Central Weekly*, 4(12), 44-45.]

民国日报(1928年10月6日).谈谈中国的新闻事业.《民国日报》.

[The Republican Daliy(Oct.6, 1928). On the Chinese journalism. *The Republican Daliy*.]

内政公报(1937a).扶植民众运动保障正当言论事项.《内政公报》,10(5),120-121.

[The Interior Gazette(1937a). Foster mass movement and protect freedom of speech. *The Interior Gazette*, 10(5), 120-121.]

内政公报(1937b).出版法施行细则.《内政公报》,10(7-12),191-197.

[The Interior Gazette(1937b). Enforcement Rules of the Press Law. *The Interior Gazette*, 10(7-12), 191-197.]

彭明(1989).《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四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Peng, Ming(1989). *Data Selections of Morden China (Vol.4)*.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前途(1936).新闻政策与国家利益.《前途》,4(9).

[Future Monthly(1936). Press policy and national interests. *Future Monthly*, 4(9).]

秦孝仪(主编)(1979).《革命文献》(第79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

[Qin, Xiaoyi(ed.)(1979).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Vol.79)*. Taipei: Central Literature Press.]

秦孝仪(主编)(1983).《革命文献》(第94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

[Qin, Xiaoyi(ed.)(1983).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Vol.94)*. Taipei: Central Literature Press.]

邵宇(2009).《孙中山政党思想研究:从近代政党与国家建设关系的视角》.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Shao, Yu(2009). *Research on Sun Yat-sen's ideology of political party*. Kunming: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邵元冲(1990).《邵元冲日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o, Yuanchung(1990). *Shao Yuan-chung's Diary*.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申报(1931年12月12日).上海日报公会宣言.《申报》.

[Shun Pao(Dec.12, 1931). The declaration of the Daily Press Association of Shanghai. *Shun Pao*.]

申报(1934年12月13日).蒋汪感电中保障言论之意.《申报》.

- [Shun Pao(Dec.13, 1934). Chiang Kai-shek and Wang Ching-wei guarantees freedom of speech. *Shun Pao*.]
- 石源华(1994).《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Shi, Yuanhua(1994).*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republican China*.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史云贵,郑华(2008).从“国家自由”到“公民自由”——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潮(1840-1949).《求索》,(3).
- [Shi, Yungui & Zheng, Hua(2008). From national freedom to civil liberties. *Seeker*,(3).]
- 陶菊隐(2005).《记者生活三十年》.北京:中华书局.
- [Tao, Juyin(2005). *Being A Journalist for Thirty Year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田炯锦(1932).共赴国难与容纳民意.《时代公论》,1(44),11.
- [Tian, Jiongjin(1932). Calling for united efforts to save the nation and tolerate public opinion. *Times Opinion*,1(44),11.]
- 万枚子(1948).中国出版法是什么东西.《再造》,1(5),12.
- [Wan, Meizi(1948).What is the press law in China. *The Reconstruction Review*,1(5),12.]
- 王健秋(1936).我国舆论对于新闻检查的认识.《前途》,4(9),75.
- [Wang, Jianqiu(1936). Public opinion about the press censorship.*Future Monthly*,4(9),75.]
- 王凌霄(1996).《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之研究(1928-1945)》.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 [Wang, Linghsiao(1996). *Research on the KMT's press policy (1928-1945)*. Taipei: Party History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 王芸生(1989).《芸生文存(第二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 [Wang, Yunsheng(1989). *Collected Works of Wang Yun-sheng (book 2)*.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 新闻杂志(1935).全国各报响应京沪报界宣言辑.《新闻杂志》,1(14),2-9.
- [News Magazine(1935).The response of the manifesto of Nanking and Shanghai press. *News Magazine*,1(14),2-9.]
- 徐小群(2007).《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自由职业团体在上海的兴起,1912-1937》.北京:新星出版社.
- [Xu, Xiaoqun(2007). *Chinese Professionals and the Republican State: The Rise of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in Shanghai, 1912-1937*. Beijing: New Star Press.]
- 严慎予(1929).党应确定新闻政策.《报学月刊》,1(2),76-77.
- [Yan, Shenyu(1929). KMT should formulate press policy. *Journalism Monthly*,1(2),76-77.]
- 益世报(1930年11月9日).停止检查新闻.《益世报》.
- [Social Welfare(Nov.9, 1930). Stopping press censorship. *Social Welfare*.]
- 益世报(1931年5月14日).保障言论自由.《益世报》.

- [Social Welfare(May.14, 1931). Protecting the freedom of speech. *Social Welfare*.]
益世报(1934年12月13日).保障言论自由沪新闻界之呼吁.《益世报》.
- [Social Welfare(Dec.13, 1934). Appealing to protect the freedom of speech. *Social Welfare*.]
益世报(1937年2月20日).论言论自由.《益世报》.
- [Social Welfare(Feb.20, 1937). On the freedom of speech. *Social Welfare*.]
益世报(1937年2月23日).蒋委员长谈话.《益世报》.
- [Social Welfare(Feb.23, 1937). Chiang Kai-shek's statement. *Social Welfare*.]
袁殊(编译)(1937).《新闻法制论》.上海:群力书店.
- [Yuan, Shu (ed.)(1937). *On the press law*. Shanghai: Qunli Bookstore.]
曾虚白(1981).《曾虚白自选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 [Zeng, Xubai(1981). *Self-collection of Zeng Xu-bai*. Taipei: Li Ming Cultural Enterprise Co., Ltd.]
张季鸾(1946).《季鸾文存(第二册)》.天津:大公报馆.
- [Zhang, Jiluan(1946). *Collected Works of Zhang Ji-luan (2nd volume)*. Tianjin: Ta Kung Pao.]
章开沅,朱英(2009).《中国近现代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 [Zhang, Kaiyuan & Zhu, Ying(2009). *Modern Chinese History*. Kaifeng: Henan University Press.]
张研,孙燕京(主编)(2009).上海市年鉴(1935年)·三.《民国史料丛刊》(1997).郑州:大象出版社.
- [Zhang, Yan & Sun, Yanjing (ed.)(2009). Shanghai Year Book, 1935 Issue (Part III). *Historical periodicals of the ROC (Vol.997)*. Zhengzhou: Elephant Press.]
浙江教育行政周刊(1931a).中央党部为国难告全国同胞书.《浙江教育行政周刊》,3(5),2.
- [Zhejiang Education Administrative Weekly(1931a).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KMT's appeal to the citizen for national crisis. *Zhejiang Education Administrative Weekly*,3(5),2.]
浙江教育行政周刊(1931b).国民政府为国难告全国国民书.《浙江教育行政周刊》,3(5),2.
- [Zhejiang Education Administrative Weekly(1931b).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s appeal to the citizen for national crisis. *Zhejiang Education Administrative Weekly*,3(5),2.]
郑大华,邹小站(主编)(2008).《中国近代史上的自由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Zheng, Dahua & Zou, Xiaozhan(ed.)(2008). *Liberalism in Modern China*.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政之(1934).中国为什么没有舆论.《国闻周报》,11(2),1.
- [Zhengzhi(1934). Why China has no public opinion. *Kuowen Weekly*,11(2),1.]
至公(1932).言论自由乎……扣留禁止.《救国周报》,(21),1.
- [Zhigong(1932). Freedom or prohibit. *Salvation*, (21),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994a).《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 [The 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ed.)(1994a). *Compilation of data documents about*

the ROC (Vol.5, No.1, Culture Part I). Nanjing: Jiangsu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994b).《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The 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ed.)(1994b). *Compilation of data documents about the ROC (Vol.5, No.1, Politics Part II)*. Nanjing: Jiangsu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二十三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1993). *Foreign historiography on modern China (vol.23)*.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中央导报(1941).上海新闻检查所之沿革及接收过程.《中央导报》,(21),38.

[Central Tribune(1941). Evolution and reception of the Shanghai Censorship Board. *Central Tribune*,(21),38.]

中央日报(1935年11月23日).一个初步的根本办法.《中央日报》.

[Central Daily News(Nov.23, 1935). The basic way of resolving the problem. *Central Daily News*.]

中央周报(1936a).敬告全国国民及日本朝野.《中央周报》,(435),6.

[Central Weekly(1936a). Letter to the nationals and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people. *Central Weekly*,(435),6.]

中央周报(1936b).全国新闻界对时局共同宣言.《中央周报》,(446),2.

[Central Weekly(1936b). Joint declaration about the current political situation of the Press. *Central Weekly*,(446),2.]

周孝庵(1930).新闻检查与报纸条例.《记者周报》,(2).

[Zhou, Xiaonan(1930). Censorship and the press law. *Journalist Weekly*,(2).]

壮行(1935).出版法之修正问题.《申报月刊》,4(8),2.

[Zhuang, Xing(1935). Amending the press law. *Shun Pao Monthly*,4(8),4.]